

生育选择与伦理责任的张力： 威廉·布莱克诗歌的启示

曾静¹ 张晓梅²

(1. 四川外国语大学 英语学院, 重庆 400031; 2. 四川外国语大学 图书馆, 重庆 400031)

摘要: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威廉·布莱克一生没有子女,但是他却在时代的影响下形成了一套关于生育的伦理认识。在《泰瑞尔》《亚美利加》《尤力申之书》和《四佐亚》等作品中,布莱克都在反复思考并建构对生育的伦理认识。本文通过剖析这些诗作,结合布莱克身处的时代背景和相关伦理背景来探讨他的生育伦理观,发掘他的泛政治性和哲学性思想根基,最终可以发现:在孕育观上,布莱克持自由主义立场,重视人的身心自由和生育自由,提倡有生命质量保障的生育;在养育观上,布莱克反复强调父母必须要担当好养育子女的责任,尊重子女天性,以自然之道去培养健康的亲子关系,不可按权势和奴役的理念去规训和惩罚。

关键词:威廉·布莱克;人口;生育;养育;伦理

中图分类号:I712.07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6414(2026)02-0104-12

0 引言

毛莉恩·N. 麦克雷恩(McLane, 2000: 118)在《浪漫主义与人类科学:诗歌、人口和物种论述》(*Romanticism and the Human Sciences: Poetry, Population, and the Discourse of the Species*)里共提及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九次,其中六次仅作为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和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等人的对照而被简要提及,另外三次则出现在注释中。仅就数据而言,在这本涉及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和人口主题的论著里,麦克雷恩很可能认为布莱克与主题词的相关度不太大,才没有为之多费笔墨。

然而,已有不止一位研究者注意到,威廉·布莱克在其作品中多次以艺术化的方式呈

收稿日期:2025-01-21

基金项目:四川外国语大学校级科研项目年度规划项目“浪漫主义诗人威廉·布莱克的人口观及其对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启示”(sisu202412)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曾静,男,四川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英语诗歌、西方批评理论和跨文化研究。

张晓梅,女,四川外国语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硕士,主要从事嵌入式学科服务、图书情报整理收集研究。

引用格式:曾静,张晓梅. 生育选择与伦理责任的张力:威廉·布莱克诗歌的启示[J]. 外国语文, 2026(2): 104-115.

现自己关于人口与生育问题的思考。斯蒂夫·克拉克(Clark, 1994: 181)指出,布莱克常通过寓言与象征手法再现人类的生育与繁衍;而崔斯坦尼·科纳里(Connolly, 2002: 106-110)则进一步认为,布莱克将艺术创作视为自己的“子女”,这可被理解为其在无亲生后代的情况下,对情感需求与生育本能的一种替代性回应。如此看来,布莱克确实是采用过诗学手法来表明他对那个时期人口生育的看法,因而借助其作品来探讨他对生育伦理的认识是有文本依据的。

如果进一步结合布莱克诗歌创作的历史语境,可以发现麦克雷恩在其论述中并未充分考虑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与威廉·高德温(William Godwin)等人同布莱克之间的现实关联。事实上,这些人物在当时的思想与社交圈中往来密切,布莱克也与高德温、理查德·普莱斯(Richard Price)等人“志趣相近”(Bentley, 2003: 111),其思想交流对布莱克的创作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鉴于马尔萨斯与高德温均直接参与了当时围绕人口问题展开的论战,布莱克对相关思想议题保持持续关注,并在思想层面上加以回应,可以被视为一种合理的推断。本文将借助相关文献资料来论证他们为布莱克的创作提供了部分思想依据。

鉴于上述文本条件和思想基础条件,在现有的英国浪漫主义人口伦理研究基础上,借助18、19世纪之交欧陆逐渐成型的人口生育和养育伦理来剖析散落在布莱克诗作中的相关内容,沿着他的诗艺和思想成长轨迹来整理和探讨他对生与养、自由与责任几个方面的伦理认识,不仅有利于拓展布莱克研究范畴,有助于解读其诗学思想的晦涩之处,而且还能以之为参考反观当今人口生育问题,助力寻求解决问题的思路。

1 英国18—19世纪之交的生育伦理

在西方社会的文化语境里,有关生育伦理的部分思想根源可追溯至《圣经》。其中,《创世纪》记载上帝命令人类“生养众多”(《创世纪》1:28),《箴言》亦指出“帝王的荣耀在乎民多;君王的衰败在乎民少”(《箴言》14:28)。这些经文在传统基督教思想中为生育与人口问题提供了重要的规范性参照,使生育不仅被视为私人事务,也被置于国家治理与政治秩序的讨论之中。此类观念深刻塑造了英国等具有深厚基督教传统的社会的生育伦理。

随着启蒙运动兴起,人口和生育伦理问题逐渐成为欧洲社会学领域的中心论题之一,是当时社会思想的重要一支。在希尔法娜·托马萨利(Tomaselli, 1989: 7)看来,人口问题与启蒙时期的伦理道德、社会礼仪、旧政权的社会价值观以及现代商业社会的价值观念密切交织。孟德斯鸠(Montesquieu)、艾特涅·诺尔·达米拉威尔(Étienne Noël Damilaville)、大卫·休谟(David Hume)和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等社会有识之士都先后参与过与之有关的讨论,他们在人口数量增减的问题上出现过明显的分歧。一些人认为欧洲的人

口呈下滑趋势,如孟德斯鸠和达米拉威尔;另一些人则认为是在增长,如休谟和伯克。

孟德斯鸠与达米拉威尔认为,专制君主制、神权与教条,以及社会的不宽容与不平等,可能是导致当时欧洲人口下降(depopulation)的因素。孟德斯鸠通过分析西印度群岛奴隶的低生育率指出,统治越严苛的社会,其出生率越低,从而说明“人不愿出生在遭受奴役的地方”(Whelan, 1991: 43)。

然而,休谟和伯克等哲学家对孟德斯鸠等人的观点持不同意见,他们认为当时的人口发展情况并非如孟德斯鸠所描述。休谟在1751年的《论古代国家的人口》(*Of the Populousness of Ancient Nations*)一文里质疑孟德斯鸠言论的合理性,并论述说那时不列颠和法国的人口数量“远超这些地区早先时期的人口数量”(Hume, 2019: 167)。伯克(Burke, 1987: 116)则在1790年的《关于法国大革命的反思》(*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中指出,法国在路易十六统治下人口实际上有所增长,人口下降的原因在于反雅格宾势力的暴力革命导致食物供给短缺,而非君主统治本身。

这些论战长期持续,对欧洲人口伦理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但是,由于当时尚无人口普查,“所有人口参数都是推测出来的”(Hobsbawm, 1996: 8),因此相关议题一直存在争议,各家见解“多少都带有意识形态色彩”(Whelan, 1991: 36)。在这场政治色彩日益浓厚的生育伦理论战中,有两位英国思想家值得注意,他们既是当时直接参与论战的核心人物,也是布莱克能够直接接触的人——他们就是马尔萨斯和普莱斯。

马尔萨斯是《论人口原则》(*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 1798)一书的作者,曾因这部作品名噪一时。他撰写这本书的初衷是想“对高德温等人至真至善的哲学论调”做出“批判性评论”(Connell, 2000: 242),剑指高德温在1793年出版发行的《政治正义》(*Political Justice*)中提出的人口原则,即:“在人类社会,人口数量永远都是和生存条件保持一致的。”(Malthus, 2008: 65)两人的正面论战让布莱克特别注意到马尔萨斯对贫困法案(The Poor Laws)的看法,并在作品里借笔下人物之口表达了反对立场。马尔萨斯认为人口的增长速度很快会超过生活物资的供给水平,只有疾病、饥荒、战争和推迟结婚才能遏制人口,尤其是贫困人口的过度增长,所以如果英国的各种贫困法案从来没存在过,那么“普通民众的幸福总量会比现在大得多”(Malthus, 2008: 38)。言下之意是说取缔那些贫困法案,让穷人自生自灭才有利于维系社会稳定和繁荣。无怪乎罗伯特·骚赛(Robert Southey)会认为《论人口原则》是“富人阶层的政治圣经”(Southey, 2019: 320)。尽管马尔萨斯的上述看法和主张,尤其是通过遏制贫穷阶层人口增长来降低社会贫困率的设想,让他受到来自高德温和骚赛等人的猛烈抨击,但他的确对19世纪的英国社会思想产生了深刻影响,他的思想甚至被称为马尔萨斯主义(Malthusianism)。

相较而言,普莱斯在人口问题上的立场更侧重普通民众利益,而非主要服务于上层社

会。他不仅是一位“非国教牧师、哲学家与政治激进分子”(Elazar, 2022: 81),也是统计员(actuary)。正因如此,他能够基于可靠数据,在1773年的《关于财产继承费的观察报告》(第三版)中阐明英国的人口一直都在下降。普莱斯直接将英国的人口衰减与政府政策联系起来,提出了在当时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政治观点,即英国政府的人口政策是“精英阶层的密谋”(Elazar, 2022: 93)。这些精英通过圈地运动掌握了大量土地和资源,使普通民众沦为“乞丐”和“奴隶”。恶劣的生存条件抑制了生育意愿,从而导致社会人口下降。出身于“不从国教(dissenter)”家庭的布莱克,与普莱斯共享的“政治同情心”(Bentley, 2003: 110)使他在人口问题上的观点趋近于普莱斯。

就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欧洲社会对养育和教育子女的伦理认识也正在经历重要变革。在众多结合伦理谈教育的人当中,布莱克最为关注的无疑是法国哲学家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卢梭及其作品《爱弥儿》(*Émile, ou De l'Éducation*)至少在两个方面对布莱克的养育与教育伦理观念产生了影响。其一事关婴幼儿的哺育方式。卢梭反对父母轻视甚至忽视婴幼儿的哺育,他成功地说服了“法国女人们重新开始对婴儿进行母乳喂养”(Damon, 1988: 351),担当起生母的责任。布莱克在《泰瑞尔》(*Tiriel*, 1789)一诗里批评年轻母亲“在躺椅上逗弄她的狗”(Blake, 1988: 285),让“母乳”与“哭泣的嘴”断开,就是在挑明同样的伦理问题。其二事关教育和亲子关系。卢梭(1996: 14)认为,婴儿自出生起便通过周遭的人与事物获得经验与认知,婴幼儿的看护方式会影响其身心健康,因此父母应承担主要照护责任。约舒华·邵登·德·吉尔(De Jel, 2019: 2-3)认为,布莱克认同这一观点,即将婴儿交由父母以外的人照料不仅不利于身体健康,还会导致教育不当,影响亲子关系。基于卢梭的思考,布莱克在其作品中明确指出,家庭中父亲的不当行为是造成畸形亲子关系及家庭矛盾的主要原因。

2 纯粹喜乐:孕育的自由

马尔萨斯的《论人口原则》由书商约瑟夫·约翰逊(Joseph Johnson)于1798年6月出版。当时,布莱克是约翰逊排版设计的“主要合作者”(Bentley, 2003: 68),因此能够最早接触到马尔萨斯的最新思想,并将他关于贫困法案的观点融入诗歌创作中。在《四佐亚》(*The Four Zoas*)的第七夜,布莱克就借反面人物尤力申(Urizen)之口模仿马尔萨斯在《论人口原则》里的论调,规训他所有的女儿都要严格遵照其旨意“揉捏出悲伤的面包”,分发给穷人们度日;“让伦理责任调谐你的喉舌”(Blake, 1988: 355),劝服穷人们听天由命。为此,他说道:

用温文尔雅的伎俩逼迫穷人靠硬面包片维持生计

他们皱眉时你们就微笑,他们微笑时你们就皱眉,看到人脸色苍白

操劳过度节欲禁食,就说他看起来健康又快乐
他的子女生病时,就让他们死,数量足够
甚至生育得太多了,如果没有这些计谋,他们迟早
会在我们的大地上泛滥成灾,如果你想让穷人的生活过得下去
分发每一块硬面包片时都要有仪式感,你要用得体的技巧去施舍
把小恩小惠夸大,迫使人想从你这里得到小恩惠,尔后郑重地施舍
如果你听到他叹息就说他是在笑,看到他脸色苍白就说他红光满面
宣扬节制节欲,就说他吃得过多,饮酒过度
麻痹了他的头脑,尽管你清楚面包和水
是他负担得起的全部。(Blake, 1988: 355)

诗文里的“你们”指的就是尤力申的女儿们,他则以神明自居,训诫治世之人要学会用一些伪善的计谋去敷衍应对贫穷人口的生计问题,企图用诡辩之辞去掩饰真实的社会顽疾,让只能消费得起低廉饮食的底层人民安于现状,即使生活窘迫,疾病缠身,病容满面却仍然觉得生活维持得下去;如果他们的子女生病,就任其自生自灭,因为这些穷人“生育得太多”,长此以往,他们会“泛滥成灾”,直接威胁“我们的大地”。这令人不寒而栗的言论就是尤力申用来规训女儿们的伦理责任的实质内容。

这段诗文大致写于1798年,正值马尔萨斯《论人口原则》出版发行之时。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认为,布莱克在诗文中抨击的是“马尔萨斯和18世纪的社会慈善”,尤力申的这段说教是“布莱克[针对马尔萨斯]最强烈的讽刺”(Blake, 1988: 959)。尤力申谈论贫困人口生计时的冷言冷语,生动地反映出那时的富人阶层不过是想利用马尔萨斯关于贫困法案的言论去降低贫困比例,“让穷人饿得只有独身禁欲”(Southey, 2019: 326),被迫节制生育,从而减少未来的贫困人口数量。

布莱克在这段诗文中不仅揭示了尤力申的冷酷与虚伪,还表达了对其所采取的管控软艺术的反感:这种治理策略实质上是以慈善之名掩饰非人性的人口政策,即通过消灭贫困人口和限制穷人生育,以降低社会贫困率,从而避免贫困人口过多对既有权力结构造成威胁。显而易见,布莱克对马尔萨斯的生育伦理持批判立场。

与之相对,布莱克在生育自由问题上的立场与普莱斯意见一致,他将普莱斯的一些激进思想通过尤力申的劲敌——奥克(Orc)在诗文中加以体现。奥克是布莱克诗学宇宙中物质世界革命力量的化身,他的革命性身份常常与性的解放和自由联系起来。在1793年创作的《亚美利加》(*America*)里,布莱克写道:

联姻的大门敞开,牧师们身上的鳞片瑟瑟作响
仓惶窜入爬虫的藏身之处,躲避奥克的火焰,

奥克之火变成狂热的欲望火环在金色的屋顶四周摇曳飞舞,
让女人们赤身裸体,泛出青春肉欲的光

为在宗教束缚中憔悴渴望而死的女人魂灵指路
挣脱她们彤红的镣铐,摆出修长的弧形身姿:
她们感到青春的活力焕发,原始的欲望,
像藤蔓缠绕在她们苍白的肢体上,此时温软的葡萄露了出来。(Blake, 1988: 57)

诗中的牧师既是宗教伦理代表又是压迫工具,一度束缚人的灵魂,在奥克面前原形毕露,形如爬虫仓惶逃窜;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奥克之火让女人们的原始欲望再度苏醒,焕发出青春的活力,露出“温软的葡萄”,这个带有浓烈性暗示的意象不难让人联想到女性的性亢奋和生育力。没有了宗教“你不准如何如何”(杨苾, 2002: 44)的伦理束缚,女性的感官欲望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催生真实的生殖欲求,从而实质性地提高生育率。《亚美利加》里的革命力量之所以能够前赴后继,与这种出自本真欲求的强盛生育力不无关系。

诚然,有评论家会认为,布莱克推崇的女性自由和性自由根本上是在为女性向男性提供性快感提供说辞,而不是女性主义者要为女性争取的真正自由。这些见解有其道理和依据。但是考虑到具体的历史语境下,布莱克创作此诗之时,他的朋友普莱斯正就人口问题积极参与公共论辩,并在题为《论说对吾国之爱》(*Discourse on the Love of Our Country*) (1789)的演说中,充满激情地号召人们摆脱奴役,“要用不可压制的声音呼唤自由”(Price, 1991: 195)。因此奥克的激进言行在此处爆发不是单纯的巧合,而是布莱克在思考性别和性自由的议题时,结合了当时的人口理论和生育伦理的结果。

奥克所倡导的解放与自由构成人类繁衍的基础,而社会的繁荣则依赖于个体的幸福感与对生活的希望。唯有认识到“一切活着的生灵都是神圣的”,肯定个体生命的价值,生命才会“因活着而喜乐”,从而产生真实的幸福感。这种幸福感带来了对生活的希望,“纵然烈火把地球吞噬”,人仍能克服艰难困境,不仅“不会灭绝”,还会进化成坚强的超人:“双足似黄铜,双膝和大腿似白银,胸膛和头似黄金。”(Blake, 1988: 54)这些诗文阐明了一个观点:人对生命的珍视与渴望并非完全依赖物质条件。即使在最恶劣的环境下,烈火焚地,人只要灵魂喜乐,便能因生命而喜乐,使生命在困境中升华并得以延续。

值得注意的是,渴望生育的诉求不仅由奥克代表男性发出。在同一年创作的《阿尔比恩女儿们的灵视》(*Visions of the Daughters of Albion*, 1793)中,思想激进的女性代表悟颂(Oothoon)也表达了类似的诉求。诗中她指出婚后女性容易成为父权体制的受害者,沦为家庭中的奴隶:“法律的魔咒把她和她恨的人绑在一起:她必须要/带着厌倦的欲念拖拽生命的枷锁!”并且,“把她的子宫唤醒”的“欲念像活着的瘟疫,很快像流星一般逝去,消失

不见”(Blake, 1988:49)。这表明,一旦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生活如奴隶,她们对生活和生活的热忱便会消失;缺乏欲望,生育可能成为不情愿甚至厌恶的行为,从而难以促进人口增长,甚至影响现有人口数量的维持。更糟的是,父母的生活状况如此,膝下子女也不得不“去做他讨厌的事”“过早地生养子孙后代”(Blake, 1988:49)。在这样的家庭和社会环境中出生的孩子无法感到快乐和幸福,只能重复父母的奴役生活,被迫生养后代,从而陷入恶性循环,从根本上影响生育率。

因此,强迫性、低质量的人口增长并不可取;相比之下,更重要的是孩子的出生与成长是否真正健康快乐:

婴儿,无畏,茁壮,幸福! 欢喜地依偎

在快乐的怀抱里;率真! 真诚,坦率,追求

晨光充满活力的乐趣;坦率面对纯粹的喜乐。(Blake, 1988: 49)

这些诗文揭示了一个原理:在父母眼中,孩子是具体、鲜活的生命体,而非简单的人口统计数字。唯有孩子能够在快乐的怀抱中茁壮成长,人类才真正沐浴于纯粹的喜乐,生命才能像晨光般充满活力,从而自然、从容地生养众多。布莱克通过鲜明对比,生动说明了粗暴且质量低下的生育观不仅将女性视为生育机器,也将新生命变为延续剥削价值的工具;相比之下,重视生命质量的生育伦理更有利于生命延续及社会发展。

剖析至此,可以看出布莱克在孕育观上重点关注的是人的精神生活以及生命质量,而不是物质生活和生命数量;他用辛辣的讽刺表明对马尔萨斯人口策略的反对,用激昂的文字声援了普莱斯等人倡导的以人为本的人口伦理,在作品中多次言明人的身心自由和生育自由才是社会进步和兴盛的基本条件,这两种自由才是可持续人口策略的根基。

3 爱恨交织:养育的责任

在前文关于“生”的讨论中,我们看到布莱克强调生命的自由与幸福感对生育的重要性。进一步分析他的诗作,可以发现,他不仅关注孕育自由,还深刻意识到养育新生命的责任关系到种群与社会的延续,并直接影响新生命的孕育与成长。布莱克对养育伦理的关注不仅受卢梭思想的影响,同时也与他的个人经历密切相关。

布莱克自幼对父母教养子女的方式格外敏感。他在家五个孩子中排行第三,尽管孩子们都渴望获得父母更多的关注,但父母却“过于偏爱二哥约翰(John Blake)”(Bentley, 2003: 6)。布莱克一再指责父母迁就放任约翰,但不仅无效,反而经常受到斥责。事隔多年,提及二哥时,他仍称:“我哥约翰是个恶人。”(Bentley, 2003: 91)这些早年经历显然塑造了布莱克对养育伦理的敏锐观察,为他对“育”的思考提供了个人经验基础。

刻骨铭心的成长经历使布莱克在其诗学创作中,结合卢梭的养育伦理,主要通过三个

家庭的故事反复审视养育与亲子关系问题。这三个家庭颇具代表性,一个是异常严苛的家庭:泰瑞尔一家;一个是相对开明的家庭:洛思和奥克一家;另一个则是神明之家:尤力申一家。三家的悲剧都与教养不善导致亲子关系畸形有关。

在布莱克的诗艺与思想成长过程中,泰瑞尔一家的悲剧最早体现了他对上述问题的深入思考。《泰瑞尔》讲述了西方君王泰瑞尔庞大家庭的悲剧性瓦解。泰瑞尔与妻子米拉塔娜(Myratana)共生养了130多个儿子和五个女儿,他的行为正如其名字所暗示——“戏用了‘暴君(tyrant)’的第一个音节,尔后与希伯来语的全能一词拼合而成”(Blake, 1988: 946)——印证了其暴君本质:掌控极权之前,泰瑞尔指责父亲哈尔(Har)软弱,把孩子都培养成了伪君子;登基之后,他不仅用锁链把兄弟扎泽尔(Zazel)囚禁起来,还把他的子女全部废为奴隶;这都不够,他还把另一个兄弟伊吉姆(Ijim)驱逐进荒野任其自生自灭。

尽管泰瑞尔膝下子女众多,但他和妻子明显不知道该怎么当好父母,未能在家庭中培育爱与亲情。米拉塔娜去世后,年迈且双目失明的泰瑞尔只能亲手为妻子挖坟,没有一个子女愿意上前帮忙,即使他下令也无济于事。根本原因在于,泰瑞尔从未将子女视如骨肉,而是将他们当作奴隶,滥用家长权力以暴力管理家庭。长期压迫导致子女联合反抗,迫使泰瑞尔夫妇流离荒野,家庭关系彻底破裂。

最终,泰瑞尔召唤“地震、雷暴、烈火和瘟疫”(Blake, 1988: 282),杀死了所有子女及其后代,只留下最小的女儿海拉(Hela)。海拉清楚父亲免她一死只是因为他失明,让她成为自己的眼睛,这仍是一种暴行,而非父女亲情。她同意带父亲离开“令人厌恶的地方”(Blake, 1988: 282),并非出于亲情或同情,而是认为祖父哈尔与祖母希瓦(Heva)会咒骂泰瑞尔的残暴行为。泰瑞尔得知她的意图后,对她施以诅咒,使她的头发变为蛇状,如同美杜莎。最终,众叛亲离的泰瑞尔“痛苦地死去”(Blake, 1988: 282),为这一家庭悲剧画上句号。

综观全诗,泰瑞尔自己是个淡漠亲情的问题孩子,“由于自幼缺少母爱,他对爱和哺育的欲求变质成强烈的妒忌,成长为一个想象力受到父亲压抑的孩子,一个叛逆的儿子”(Webster, 1983: 47),他才会毫不留情地将亲生父母赶到荒山野岭孤独终老,将亲兄弟或囚禁,或放逐,奴役他们的子女而无半点愧疚;在他组建家庭成了一家之主后,他从一个被忽视的孩子转变成一个不称职的父亲,“老是咒骂苛责子女”(Webster, 1983: 47),教育无方,恣意滥用家长强权,任凭报复心以暴易暴,对自己的子孙痛下杀手,无一放过。像他这样的家长根本不知养育责任为何物,一味采用暴力手段对待子女,家庭中的亲子关系必然危如累卵,人丁再多,终究难免冰消瓦解。

如果布莱克笔下的家庭悲剧仅限于泰瑞尔一家,那不足以充分体现他对亲子教养问题的深入思考。相反,布莱克并未放弃这一影响深远的主题,五年后,他在其逐渐成形的诗学

宇宙里,再一次通过洛思与奥克之间的悲剧探讨亲子养育伦理。不同以往,这次有了卢梭教育伦理的印记。奥克是洛思(Los)和伊妮萨梦(Enitharmon)的长子,布莱克在《四佐亚》里说奥克是从母亲的心里生出来的,洛思和伊妮萨梦为此还被驱逐出永生世界。按常理来说,牺牲那么大,父母多少都会带着爱去养育自己的孩子,然而情况却截然相反,比起布莱克,奥克的成长经历更糟。这一家恶劣的亲子关系与父母不和存在必然联系。洛思和伊妮萨梦虽然形同尘世的普通夫妇,但二人的关系却显得十分紧张:

在他的胸中爱与恨交替;她的胸中不屑与嫉妒交织

……因为感到羞耻和恐惧,他们既不亲吻也不拥抱。(Blake, 1988: 305)

夫妇二人既不亲吻也不拥抱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持不同的信仰:洛思执着地认为只有真实的信仰才可以挽救阿尔比恩(Albion),即英国;而伊妮萨梦则因为缺乏辨别力,不识真伪,完全沦为伪神尤力申的信徒,坚信他就是在拯救阿尔比恩。无怪乎他们虽有夫妇之名,却无夫妻之实,不得不忍受爱与恨的交替折磨。奥克就在这样的家庭氛围里慢慢长大,在《尤力申之书》(*The Book of Urizen*, 1794)里,父亲洛思越来越嫉妒奥克对母亲的爱,这样的情感“落到石头上/环环紧扣/形成一根铁链”(Blake, 1988: 80)。最终:

他们把奥克带到山顶上。

噢!伊妮萨梦哭得多悲凉!

他们用那嫉妒的链条

把他年幼的肢体绑在石头上。(Blake, 1988: 80)

诗文寥寥数句揭示了洛思对儿子的狠心、伊妮萨梦的伤心以及布莱克的痛心。这种行为明显违背了18世纪的养育伦理。其时,不仅卢梭在《爱弥儿》中提醒父母,应自孩子诞生之时起“就把他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他尚未成人,你就不要放弃他:……真正的保姆是母亲,则真正的教师便是父亲”(卢梭, 1996: 25-26),也就是说,父母应兼任教师与保姆,关心孩子身体、智力和道德心的成长,不能半途而废,方能培养健康的亲子关系。此外,为了确保孩子的健康与幸福,“为了孩子本身,为了整个家庭,也为了国家和政府”(Benzaquen, 2006: 24),18世纪欧洲社会要求父母承担新的责任,将时间投入到培养后代上。但是,奥克的父母不但没有尽责任去养育奥克,不去用心培养健康的亲子关系,反而视孩子为累赘,在他尚未成人的时候就弃之荒野以为惩戒,与时兴的教育理念格格不入。

父不父,则子不子。奥克长大之后对父亲没有半分敬爱之意,在《四佐亚》里可以看到“凶狠的奥克带着彤红的狂怒,黑色的雷云围着洛思翻滚”(Blake, 1988: 362)。奥克对父亲的恨在这红与黑的对峙中暴露无疑,二人虽是父子,却怒目相向,剑拔弩张。这足以说明家庭的亲子伦理关系需要“明理有识”的父母“在尽责任的先后和采取怎样的作法方面配合一致”(卢梭, 1996: 26),精心经营,才能健康平衡;蒙昧粗暴的手段只会塑造出奥克这

样羈傲不逊的子女,终将与父母反目成仇,引发家庭内乱,酿成悲剧。

回顾上述两个尘世家庭,泰瑞尔身为家长家破人亡,身为帝王祸国殃民,家国梦灰飞烟灭;洛思虽然深明大义,但在教养子女的义理上却蒙昧落后,落得父子反目,引人唏嘘。然而,布莱克笔下因为教养伦理落后而支离破碎的家庭何止这两个。上梁不正下梁歪,两个尘世家庭的亲子悲剧其实都可追溯至一个神明之家:尤力申之家。如果说洛思一家仅仅是受尤力申的间接影响,那么泰瑞尔就应是受了直接影响,因为有研究者发现,布莱克在完善他的诗学宇宙时揭开了泰瑞尔的身世——他其实是“尤力申的长子”(Allen, 1940: 61),所以泰瑞尔的家族悲剧可以溯源至尤力申的治家之道。虽然在《泰瑞尔》中布莱克没有谈尤力申如何教养泰瑞尔,但他在《尤力申之书》和《四佐亚》里先后讲述了发生在尤力申和子女们之间的悲剧故事,从中可以反观尤力申和泰瑞尔的养育之道。

在《尤力申之书》里,尤力申创造了现实世界和他的子女,其中赛瑞尔(Thiriel)即泰瑞尔,是长子。为人之父,尤力申却对自己的孩子很不满意。他厌恶地看到“悲伤的儿女们在崇山峻岭中/流泪!恸哭!”(Blake, 1988: 81),不反思“在出生的时候,孩子就会啼哭;他的婴儿时期就是在啼哭中度过的”(卢梭, 1996: 25),却只在意子女们搅乱了他精心设计的世界。于是他心生厌倦,失去耐性,像泰瑞尔一样采用粗暴的教育办法,先把乱作一团的子女咒骂一通,然后用冷酷的宗教管控儿女们。结果当然是在他的权势和奴役之下,他的子女天性尽失,全都退化成爬行动物,困在大地上,沦为失败的教育伦理受害者。

三年后,布莱克在《四佐亚》中重启这个故事,这一次关于尤力申和儿子们的叙事更丰满具体,人物塑造也更细致。布莱克将之前一笔带过的内容作了些补充,从中可以得知尤力申是用心培养了儿子们的,把他们养育成“智慧之子”(Blake, 1988: 343),和他一起设计建造“尘世之卵”(Mundane Shell),即现实世界。看上去他们高高在上,“权衡并安排一切”(Blake, 1988: 321),与尤力申一同住在银色山岭里,父慈子孝,一派和睦。然而,布莱克点破了父子之间的真实关系:他们虽然像晨星那样熠熠生辉,却都是“顺从的儿子们”(Blake, 1988: 326),不得有半点违逆;他们的宿命不过是做父亲的提线木偶,像傀儡一样执行他的命令而已,尤力申与他们的关系更像是君臣和主奴,而不是家人和血亲。果不其然,当尤力申在与另一位佐亚卢瓦(Luvah)的对抗中失利,他迁怒于妻子和儿女,和《尤力申之书》里一样,他恶毒地咒骂儿女,让他们下地狱受折磨。这翻脸不认人的举动让人看清了尤力申作为父亲的育儿理念:膝下子女不过是自己的臣子和奴仆,甚至无异于实现他个人野心的工具和棋子;按他的意思去做就相安无事,一旦不如他意就严惩不贷,心狠手辣,丝毫不念亲情和苦劳。无怪乎他的四个儿子与他倒戈相向,带领他的劲敌欧苏纳(Urthona)的军队和他兵戎相见,至亲终成死敌,亲子关系彻底破裂,再次重演父不父则子不子的伦理悲剧。

由此可见,上述三个典型家庭的亲子故事体现了布莱克在持续深化对养育伦理的理解。在卢梭的影响下,他通过尤力申等父权角色的教育失败说明,在教育中采取规训与惩罚只会强化权力和奴役观念,最终扭曲并扼杀子女的天性。按尤力申那种方式培养起来的孩子“既是奴隶又是暴君”,终将“暴露其愚昧、骄傲和种种恶习”(卢梭,1996:25)。更糟糕的是,“这种做法会被后代模仿,代代相传,不断重演”(Webster,1983:47)。因此,尤力申之子泰瑞尔的家族悲剧如出一辙,“有此父斯有此子,人道常也”(孔丛子·居卫)。试图统御布莱克诗学宇宙的尤力申最终众叛亲离,功败垂成,其养育理念不足为法,应予摒弃。

4 结语

总体来看,布莱克在上述多部作品中再现并思考了人口问题与生育伦理,形成了既体现时代特征又具有个人特色的认识。在生与养、自由与责任这几个关键议题上,他态度明确、立场鲜明。

关于孕育,布莱克通过诗学手法展现了自由主义倾向:一方面质疑马尔萨斯等人口理论,抨击服务于社会上层结构利益的贫困法案;另一方面强调尊重生命权利,保障人的身心自由与生育自由。他的作品体现出这样一种认识,即具备生命质量保障的生育更有利于实现可持续的人口策略,而单纯的数量增长可能带来更为复杂的社会挑战。这一认识对当今乃至未来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技术融合时代仍具有启示意义——人口的高质量发展应是历史趋势。

关于养育,布莱克结合自身成长经历,在至少三部作品中通过典型家庭的悲剧展现对卢梭教育伦理的认同,阐明父母必须承担养育责任,亲力亲为,尊重子女天性,以自然之道培养健康的亲子关系。若父母按权势或奴役理念施以粗陋规训与惩罚,亲子关系将被异化为君臣主奴,进而成为各种家庭与社会悲剧的诱因。这类悲剧不仅会在布莱克的作品中反复上演,也可能在现实社会中不断重现,对家庭、社会乃至国家皆无善果,应引以为戒。

参考文献:

- Allen, L. H. 1940. Tiriell: The Death of a Culture[J]. *The Australian Quarterly* (12): 58-66.
- Bentley, G. E. Jr. 2003. *The Stranger from Paradise: A Biography of William Blake* [M]. Paul Mellon Centre BA.
- Benzaquen, Adriana S. 2006. The Doctor and the Child: Medical Preservation and Management of Children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G]//Muller Anja. *Fashioning Childhood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Age and Identity*. London: Routledge: 13-24.
- Blake, William. 1988. *The Complete Poetry and Prose of William Blake* [M]. David V. Erdman (ed). New York: Anchor Books.
- Burke, Edmund. 1987.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 [M]. J. G. A. Pocock (ed).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 Clark, Steve H. 1994. *Sordid Images: The Poetics of Masculine Desire* [M]. London: Routledge.
- Connell, Philip. 2000. Wordsworth, Malthus, and the 1805 Prelude[J]. *Essays in Criticism* (50): 242-267.

- Connolly, Tristanne. 2002. *William Blake and the Body* [M]. Basingstoke: Palgrave.
- Damon, S. Foster. 1988. *A Blake Dictionary: The Ideas and Symbols of William Blake* [M]. Hanover and London: 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
- De Jel, Joshua Schouten. 2019. Fathers, Sons, and Monsters: Rousseau, Blake, and Mary Shelley [J]. *Palgrave Communications* (5:78): 1-9.
- Elazar, Yiftah. 2022. The Downfall of All Slavish Hierarchies: Richard Price on Emancipation, Improvement, and Republican Utopia[J]. *Modern Intellectual History* (19): 81-104.
- Hobsbawm, Eric. 1996. *The Age of Revolution: 1789—1848* [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 Hume, David. 2019. *Hume's Political Discourses* [M]. William Bell Robertson (ed). The Walter Scott Publishing Co., Ltd.
- Malthus, Thomas. 2008. *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 [M]. Geoffrey Gilbert (e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cLane, Maureen N. 2000. *Romanticism and the Human Sciences: Poetry, Population, and the Discourse of the Species* [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rice, Richard. 1991. *Political Writings* [M]. D. O. Thomas (e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outhey, Robert. 2019. Inquiry into the Poor Laws, & c. [C]// Carol Bolton. *Romanticism and Politics 1789—1832* (Vol. IV).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 Tomaselli, Sylvana. 1989. Moral Philosophy and Population Questions in Eighteenth Century Europe [C]//Michael S. Teitelbaum and Jay M. Winter. *Population and Resources in Western Intellectual Tradi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7-29.
- Webster, Brenda S. 1983. *Blake's Prophetic Psychology* [M].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 Whelan, Frederick G. 1991. Population and Ideology in the Enlightenment [J].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12): 35-72.
- 布莱克. 2002. 天真与经验之歌 [M]. 杨苡,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 卢梭. 1996. 爱弥儿(上卷) [M]. 李平沅,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The Tension Between Procreative Choice and Ethical Responsibility: Insights from William Blake's Poems

ZENG Jing ZHANG Xiaomei

Abstract: The English romantic poet William Blake does not have a single offspring, in spite of which he formulates his own ethical insights into procreation and child-rearing under the influence of his times. In *Tiriel*, *America*, *The Book of Urizen* and *The Four Zoas*, Blake ruminates to build his arguments over procreation and child-rearing.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specific historical and related ethical backgrounds to analyze the above poems for the pan-political and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of his ethical views, as an attempt to elucidate that, procreation-wise, Blake supports liberalism to emphasize physical-mental liberty and liberty of procreation, advocating quality-guaranteed procreation; child-rearing-wise, Blake puts forth repeated emphases on parental duties to children, which values children's innate nature, wholesome and natural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s and children, while disvaluing discipline and punishment based on conceptions of power and slavery.

Key words: William Blake; population; procreation; child-rearing; ethics

责任编辑:冯革